

评生命智因学与外星人

旗晨峰

Recommended by 王德奎 y-tx@163.com

Abstract: 生命智力智因与外星人风暴王红旗先生编辑的《重构人类知识体系》一书，解释“重构”是指万事万物的变化。而重构论或“重构学”是指研究万事万物变化，且注重实施者对万事万物的重新构造、重新建构的知识学问和科学体系。凡是发生重构的地方，一定会有相应的实施者。实施者可划分为三种情况：物质结构的自然变化，其实施者是万有智力；生命结构的变化，其实施者是生命智力；万事万物的人为变化，其实施者是人的大脑思维生命智力系统。

[旗晨峰. 评生命智因学与外星人. Academia Arena, 2012;4(3):31-34] (ISSN 1553-992X).
<http://www.sciencepub.net>. 5

Keywords: 生命智力; 智因; 外星人; 重构; 大脑思维

一、生命智力智因与外星人风暴王红旗先生编辑的《重构人类知识体系》一书，解释“重构”是指万事万物的变化。而重构论或“重构学”是指研究万事万物变化，且注重实施者对万事万物的重新构造、重新建构的知识学问和科学体系。王红旗先生本身就是一个“重构主义”者，甚至达到编辑《重构（王红旗）文集》的热忱。而“重构论”2012年的进展，是“搜寻地外智慧生命”的人认为：“外星人或许已经进化到和自然融合为一体难以发现”，这成为王红旗先生批判达尔文，重构“生命智因学”以来的最大突破。这是加拿大科幻作家卡尔·施罗德（Karl Schroeder）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点，试图解决天文观测与费米佯谬之间的矛盾，他说：“任何足够先进的技术都与自然无异”。这种人类历史背后的发展动力与天道运化规律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王红旗是和施罗德各自一方在独立研究，所以请看王红旗先生是怎样推出“生命智因学”的？

重构（王红旗）先生说：凡是发生重构的地方，一定会有相应的实施者。实施者可划分为三种情况：物质结构的自然变化，其实施者是万有智力；生命结构的变化，其实施者是生命智力；万事万物的人为变化，其实施者是人的大脑思维生命智力系统。所谓“重构”，一般主要是指人的大脑思维生命智力系统，对万事万物进行的重新构造或重新建构。所以“重构”者可以重构“思维重构宇宙”、“信息重构宇宙”、“大脑重构宇宙”、“智脑重构宇宙”。即用不着像达尔文那么辛苦，去作两年多的巡洋考察才创建的“进化论”。重构先生根据生命智力学暨智因进化论，指出“生命与生命智力同时起源、同步进化，生命与非生命的分水岭在于生命拥有生命智力；生命智力的实质是使用间接信息达成期望效应”。

“所有的生命都拥有生命智力，不同的生命拥有不同结构、不同形式和不同层次的生命智力，

生物进化的实质是生命智力主导实施的生存方式多样化和生存技术复杂化，以及生命智力系统自身的不断发展。

“地球上的生命具有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生命智力或生命智力系统，它们主要有DNA生命智力系统、细胞膜生命智力系统、单细胞生命智力系统、细胞膜网络生命智力系统、神经元细胞生命智力系统、大脑思维细胞生命智力系统，以及生命智力巨系统等等。其中，DNA生命智力系统主要由基因和智因组成，智因即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新基因。所有的生命智力系统都是运行在相应的生命体物质结构之上的，‘我’就是生命智力系统的自觉，‘灵魂’属于高级层次的生命智力”。这且不是对施罗德的“任何足够先进的技术都与自然无异”定律的精辟的解读：外星人与地球人已融合为一体吗？王红旗先生说，他根据生命智力学暨智因进化论的基本原理，还可以得到30余项重要的推论。王红旗先生甚至说：“如果说相对论是对牛顿古典力学的超越，那么生命智力学暨智因进化论则是对达尔文古典随机进化论的超越”。

令人饶有兴趣的是，生命智力学能否有智因进化不升反降的情况呢？因为王红旗先生说，生命智力学暨智因进化论的重要推论之一是“生命智力的发展是无止境的”。在《超越谷歌-全球网脑新商机》（高路，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一书中，还有高路和他的团队阐述致力于通过技术实现智能搜索引擎、互联网操作系统WebOS和全球智慧网脑的匹配，以实现“所见即所需，所得即所需”的工作。重构论的实施者是否会产生重构“头脑风暴”，已经引起社会的关注。因为据2012年2月9日新华社发表黄敏先生的文章介绍，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卡里莱昂研究所里德·蒙塔古教授带领的研究小组，负责的一项研究证实：开会或许使人智商降低。蒙塔古教授的研究方法是，从两所大学征募70名志愿者，

先让他们参与智商测试。大家的平均智商大约126。随后按照测试成绩，将志愿者分成5组，进行第二次智商测试。测试时，志愿者每完成一道题，研究人员便向其反馈他（她）在小组中得分排名。结果，尽管每组志愿者第一次智商测试成绩相当，第二次测试时多人成绩显著下降。第二次测试时，研究人员从每组随机抽取2人，借助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扫描他们的大脑。蒙塔古教授小组的成员肯尼思·岸田称：当被告知自己在小组中得分排名时，志愿者大脑多个区域变得活跃，尤其是杏仁核、前额叶皮质层和伏隔核区域，它们关乎情感处理、问题解决以及奖赏和愉悦。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身处团队环境影响智力表现。原因或在于“头脑风暴”、劳资谈判等小组会议，可能令与会者急于表现良好，将部分脑力“转移”至维持在团队中的社会地位。所以“头脑风暴”反而令大脑“死机”，使智力表现显著下降。可见用重构“头脑风暴”本身，就可以检验生命智力或智因有没有智力或智因。

据王红旗透露，重构“头脑风暴”使智慧网脑公司联合创始人高路写信给他，要求与他合作，希望向他学习。从而促进全球智慧网脑的量子跃迁，与星际意识谐振对接。这不是类似地球人与外星人融为一体的冲刺吗？王红旗和高路先生说，这确实是将传统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学观，提升为宇宙生命整体进化的层面，以此来指导互联网进化论和未来的互联网产品设计。

王红旗、高路和施罗德等先生是一个意思：人类生命智力将无法判断，这种超级智力系统究竟是生命智力系统还是超自然智力系统？即类似说，人们不知王红旗和高路先生，是纯地球人还是地球人与外星人融为一体难以区分的“重构人”？重构（王红旗）先生已出版《生命智力学》等专著说：“人类的生命智力已经非常发达，如果不能正确使用，将对自身和全球造成不可挽回的灾难”。“生命智力学”的创建问世，标志着达尔文古典随机进化论霸主地位的终结”。二、什么叫生命智力或智因？关于生命智力或智因，我们不谈“思维重构宇宙”、“信息重构宇宙”、“大脑重构宇宙”、“智脑重构宇宙”。数学已是地球人公认的一种“智慧”。据张奠宙、王善平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陈省身传》说：“数学的精神，自从发皇于古希腊，古今一贯，从未中绝，一切的现代学问中，最能守持古典精神的，仍是数学”。《陈省身传》说：数学精神的源头在古希腊哲人那里。菲尔茨奖没有奖金，只有奖章，但它是数学界的最高荣誉，奖章上刻着的是古希腊阿基米德的头像。数学有“经典的”与“现代的”之分。发思古幽情的现代人，往往喜欢“经典的”东西，不喜欢“现代的”东西，文章、艺术、建筑，无不是古胜于今。数学不同，数学显然是“现代的”

胜于“经典的”，现代数学把经典数学吃进去了，消化掉了，几乎没有排出什么“糟粕”；经典的数学优美，现代的数学除了优美，更有壮美。如俄罗斯人佩雷尔曼。佩氏在本世纪初成功证明了庞加莱猜想，这是克莱研究所公布的新千禧年七大数学难题的第一题。2006年国际数学联盟给佩雷尔曼菲尔茨奖，他没有要；2011年克莱研究所给他百万美元奖金，他也没有要。他说：“如果我的证明是正确的，就不需要任何其他形式的肯定。”佩雷尔曼也许是截断众流的孤傲，陈省身则精神内守，而又随波逐浪，佩氏大推开，陈氏大洒脱，二者皆好。但陈省身更为圆熟，因为佩雷尔曼毕竟不是中国人。陈省身经常说：“为了个人名利，数学不是一条坦途。”人说政治是屁股指挥脑袋，我说数学能脑袋端正屁股。“追求知识”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知识不能被占有，所以没有“智者”；如果知识比作财富，“智者”就是大富翁，然而知识不是财富。追求知识的前提是“知其不知”，所以真正的知识必然是“无知之知”。关于“外星人”知识就是一个从“无知”到有知的“无知之知”，但这个过程是有主持活动系统的公开过程，而不类似“水变油”许钦定理的是“保密”活动过程。据国外媒体报道，对于外星文明的搜寻工作一直以来受到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的困扰，这就是“费米佯谬”：外星人在哪儿呢？宇宙这么大，如果只有我们，那是不是太浪费地方了？那么回到我们的原点：既然宇宙中还存在着其他生命，那么它们在哪儿呢？于是费米通过计算，假设银河系中果真存在外星智慧生命，考虑到银河系古老的年龄以及其它因素，它们应当早已经造访地球了。但事实是我们的“大寂静”宇宙一片安宁，无声无息。这样的矛盾构成了现代天文学上的最大挑战之一。哈佛大学的天文学家霍华德·史密斯认为，我们在宇宙中是独一无二的。而更多的专家倾向于赞同西斯·肖斯塔克的观点：“如果最终证实宇宙中真的没有其它高级生命的话，那将是个奇迹。”所以要进行“寻找地外智慧生命”计划的活动项目。这个项目认为，或许有朝一日会截获一条光谱信号，显示外星生命正将他们的核裂变废料倾倒入恒星之中，或者我们会探测到他们的核聚变反应堆泄漏出的氦的信号。但如果这些外星技术文明可能已经实现了“绿色化”，即达成了与自然界的平衡态。尽管我们缺乏直接观测证据，也没有探测到所谓泄漏出来的无线电信号，但我们的周围却有可能正被先进的技术文明所包围，这些技术文明巧妙地与星系背景融为一体。或许在宇宙中，只有那些最终达成了生态平衡的技术文明才可以长久地存在下去。但反过来，费米佯谬又是：如果外星智慧生命，或许已经由于自己的原因导致了毁灭。这些原因可能包括核战争，生物恐怖主义或者失控的纳米技术。然而即便如此，他

们的一部分技术成果应该还会保存下来。这当然不是类似重构（王红旗）先生的生命智力学或生命智因进化论说的：实施者是指人的大脑思维生命智力系统，对万事万物进行的重新构造或重新建构。而是如达尔文亲自科考类似的现实活动。例如，即便有朝一日，人类作为一个种族彻底灭亡，我们至少还有两颗美国宇航局的先驱者号探测器（先驱者10号和11号），两颗旅行者号探测器（旅行者-1号和2号）以及目前正飞往冥王星等5个人工设备，游荡在星系之中，述说着曾经的人类文明的故事。这不是科幻，也不是仅是大脑的思维。先驱者号飞船上携带的铭牌，旅行者号上携带的金质唱片，是地球人实实在在活动的直立智慧生命的证明。即便这些只是类似无人飞船。即便这些飞船的复制过程是完美的，它们的内部内置有一个电路算法程序，可以约束飞船不至于永远不停地复制自己。即便按照这种逻辑，反过来应当已经有大量的机器“外星人”造访过我们太阳系。应当散布着无数的这种无人飞船类似机器的探测器。并且很显然，地球当然会引起对方的极大兴趣。但即便如此，如果哪一天，我们真的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机器探测器，那也一点不让人吃惊，反而要是最终没有发现这样的探测器，那才会让人意外。因为如果这些机器探测器都是以“绿色”技术制造的，那样的话，想要找到它们，真的就像是大海捞针，因为它们将会和太阳系的自然背景完美地融为一体。即如果真有王红旗、高路等先生说的生命智力学或生命智因进化论、全球智慧网脑与星际意识谐振对接器，那也类似是和外星人“绿色”技术制造的自然背景，完美地融为一体的。即类似英国作家亚瑟·克拉克说的那句名言：“任何足够先进的技术都与魔法无异。”或者类似许驭定理说的：“在任何国家，无论国家拨款的原始创新，还是民间自发自费的千辛万苦原始创新，一旦事关国家兴衰成败，都会被列为国家级保密项目；自觉遵守国家保密法规并作出了重大贡献，国家绝对不会亏待个人；相反，如果在一定时期不谨慎造成泄密，除了给国家造成损失，个人的人身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

王红旗、高路和许驭等先生的这类智因，是不等同于施罗德解决天文观测与费米佯谬之间存在矛盾的智因。科幻作家卡尔·施罗德的意思是，如果这些外星人先进的技术文明，已经实现了乌托邦式的社会，那么他们不会产生任何我们可以探测到的废弃物。他们已经实现了“绿色科技”，因此他们可以彻底“融入”星系之中。也因此他们和自然界本身已经无法区分开来。这也就意味着：缺乏对于外星文明存在的直接观测证据，恰恰就是外星智慧文明存在的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三、如何保护真实的生命智力或智因从以上看来，首先是要分清什么是

真实的生命智力或智因。这虽然很难，但也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已经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民族之一，中国传统有两类智慧：第一类战略是说对方错了，另立方法竞争；第二类战略是“田忌与齐王赛马”，相同方法竞争。而所谓“田忌与齐王赛马”战略的智慧类似说，第一阶段，我国是以自己的“科学下等马”对西方的“科学上等马”；第二阶段，以我国的“科学上等马”对西方的“科学中等马”；第三阶段才是以我国的“科学中等马”对西方的“科学下等马”。总的比赛下来，田忌是2:1胜过齐王。由此来分生命智力或智因，也就是两种，即第一种类似是说对方错了，另立方法竞争；第二种类似是“田忌与齐王赛马”，相同方法竞争。王红旗先生说他的“生命智力学的创建问世，标志着达尔文古典随机进化论霸主地位的终结”。这显然是推证不出来的。因为王红旗先生用的是属于中国人的第一种智慧：说对方错了，另立方法竞争。即王红旗先生是说达尔文错了，他是另立方法---重构生命智力学或生命智因学，进行竞争。这样我们不是说王红旗先生错了，而是说王红旗先生任重道远，还需努力。因为这是一种平行的竞争。公认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人还不少。其次，王红旗先生推证达尔文错了，用的是类似三段论，是用“如果说相对论是对牛顿古典力学的超越”，那么生命智力学暨智因进化论则是对达尔文古典随机进化论的超越。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牛顿的古典力学的竞争，恰巧用的是类似我国的第二种智力或智因：相同方法竞争。这是有彭罗斯证明的。即类似爱因斯坦用他的“下等马”韦尔张量，对牛顿的“上等马”韦尔张量，爱因斯坦是赢不了牛顿。但爱因斯坦用他的“中、上等马”里奇张量，对牛顿的“中、下等马”韦尔张量，牛顿无还手之力。彭罗斯的解释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方程，包括韦尔张量和里奇张量。韦尔张量囊括类似平移运动的相对加速度，对球面客体单向的拉长或压扁作用；这与牛顿力学的性质对应。而里奇张量囊括当球面客体有绕着的物体圆周运动时，被绕着的物体的整体都有一个纯粹向内的加速，产生有类似向心力的扩张或收缩的缩约、缩并作用。韦尔张量，韦尔是测量类似自由下落的球面的潮汐畸变，即形状的初始变形，而非尺度的变化。里奇张量，里奇是测量类似球面的初始体积改变。这与牛顿引力理论要求下落球面所围绕的质量，和这初始体积的减少成正比相合。张量与矢量相比，是直接进入了一种“关系域”，即张量比矢量更复杂一些，但同时里奇张量也比韦尔张量更复杂一些。

因为按彭罗斯的说法，韦尔张量类似“一对一”，而里奇张量类似“一对多”。而里奇创立里奇张量，爱因斯坦应用里奇张量，只是类似才开了一个头。因为如果说里奇张量是囊括当球面客体有绕着的

物体圆周运动时，被绕着的物体的整体都有一个纯粹向内的加速，产生有类似向心力的扩张或收缩的缩约、缩并作用；那么为什么这个客体能绕着那个物体作圆周运动？客体绕着的那个物体是怎么形成的？都没有说。其次，客体绕着的那个物体如果有自旋，里奇张量又是怎么样的形式？客体绕着的那个物体如果有破裂、变形、内外翻转，里奇张量又是怎么样的形式？即使是嘉当、陈省身、彭罗斯、欧拉、丘成桐等，也都才研究了一部分，所以在朗道的《场论》和彭罗斯的《通往实在之路》等书中，对里奇张量的具体数学描述也仍然语焉不详。

这里，里奇张量和韦尔张量很容易被人弄反。因为里奇张量和韦尔张量都具有向心的引力作用，只是韦尔张量类似“一对一”，而里奇张量类似“一对多”，所以“韦尔张量使得物体被拉伸，或者扭曲——这个就是潮汐力”，并不等同于里奇张量在引力中，是全方位效果的使得朝向下落的那个引力源的物体的缩约、缩并作用。在西方，里奇张量起因于圆周运动的数学进化和物理射影，这是由意大利几何学家格里高里·里奇（Gregorio Ricci）想到的。

里奇（1853~1925），意大利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张量分析创始人之一。1884~1894年里奇通过研究黎曼、李普希茨以及克里斯托费尔微分不变量的理论，萌发了绝对微分学（现称张量分析）的思想。1896年发表了内蕴几何学的论文，进而提出缩约张量（里奇张量）的概念，这是一种协变或逆变张量的集合。1900~1911年里奇和他的学生列维-齐维塔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但直到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中使用了里奇理论之后，里奇思想才受到普遍的重视。

所以重构（王红旗）先生说的“重构”和大家说的创新，也是分为两种的：即第一种类似是说对方错了，另立方法的重构和创新；第二种类似是“

田忌与齐王赛马”，相同方法竞争的重构和创新。对于第一种的重构和创新，我们一般不给予评判，即使类似陈省身教授说的那种“政治是屁股指挥脑袋”的问题。而对于第二种的重构和创新，我们可以说一般90%的重构和创新，都类似模仿、组合、改进、复制，这是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只说明真实的的重构和创新，不容易。人类需要保护这种的生命智力或智因。这也是人们说的“科学权”，和一个国家或民族强盛不衰的根本。这个发现有一则史料，是《近代工业的兴起》一书中讲的：科学权发现的曲折和命运联系瓦特及其蒸气机：瓦特是在英国一所大学实验室工作发明蒸气机的，但十多年前大学里的师生知晓却无人过问。终于有一天来了一位贫穷的老头，他是偶然闯进大学里来捡拾破烂的。他看了瓦特的表演蒸气机后说，他有救了。原来他是一个大矿山的资本家，十多年前矿井因水淹，他破产了。瓦特的蒸气机唤起他的希望，也唤起了瓦特的希望。往日老头在社会上留下的信用，以及他的百般游说，一些往日的银行家友人支持他与瓦特办起了蒸气机生产厂家。蒸气机在英国矿山、纺织工业以及火车、轮船交通等上的应用，引起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商人的注意，他们用高薪挖走了一些蒸气机厂的技工。因此，英国与这些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斗争的结果，有八个国家和英国签定了和约。和约认为，有价值的科技创造是人类共同财富，任何国家因不用而毁灭它，都是对人类的犯罪。因此和约签定国对科学家的自由流动，不能限制；但对工厂花钱培训出的高级技工流动，却有严格的限制。道理是，他们不是科技原理的第一创造者，而是二传手；没有得到厂主同意的流动，一经发现，逃到的和约签定国，都应该给予送还或允许追回。该书认为，这项国际条约的签定，引领了近代工业的潮流。

2/11/2012